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运用与阐释

宋 俭 粟 荣

[摘要]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期，他致力于系统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出了中国式阐释，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国民革命失败后，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指出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致性，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革命性阐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达对唯物辩证法进行探索性研究和阐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关键词] 李达；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22)01-0004-11

“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①李达便是这群“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的“新青年”中的杰出一员。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由于与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矛盾而一度脱离了党组织，但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运用和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文拟就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运用与阐释作初步探讨。

一、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是唯物史观。”^②1919年5月，《晨报》副刊登载渊泉翻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在中国系统介绍唯物史观学说，该文先后被《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转载，在中国进步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李大钊、杨匏安等分别于当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Marxism）（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给予高度肯定。杨匏安指出：“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② 陶德麟、何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会主义也。”“自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之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①由于接受唯物史观的途径和知识背景的差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各有侧重。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的主要传播者和阐释者，他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注重运用唯物史观介绍和阐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二是注重运用唯物史观来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需要指出，运用唯物史观来介绍和阐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杨匏安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以唯物的史观论为基础之科学的社会主义”^②。李大钊更指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③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最初也是与辨明何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密切联系的，这一特点尤其集中体现在他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

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行，受国际社会主义派别分立的影响，中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呈现出众说纷纭的状况，以至于时人发出了“中国今日究竟能彻底明白社会主义的有几个人”的感叹^④。当时，张东荪、梁启超等在《时事新报》《改造》等报刊杂志上陆续刊发文章，宣扬英国哲学家罗素“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主要病症是“无知病”“贫乏病”，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⑤，以此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宣传。面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挑起的论战，李达率先作出反应，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言论进行批判，并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具体阐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针对张东荪、梁启超提出的中国生产事业不发达、无阶级剥削与对立的观点，李达指出，受军阀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双重掠夺和压迫，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更加明显，因而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针对张、梁等提出的中国只能走“奖励”资本家的生产事业、“开发实业”的改良主义道路的观点，李达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需要发展生产，差别在于用何种生产方法。社会主义的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力制造生产物平均消费”，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因此，开发实业最好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借国家立法施行“温情主义”社会政策的主张，李达指出，必须联合一切工人组织革命团体并联合国际无产阶级，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厉行社会主义运动，以“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⑦。李达还对国际上各派社会主义作了对比和区分，认为只有多

① 杨匏安：《马克思主义（Marxism）（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② 杨匏安：《马克思主义浅说》，《杨匏安文集》，第190页。

③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④ 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⑤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第617～623页。

⑥ 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⑦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一卷，第388、380页。

数主义(即Bolshevism)是“完全尊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它将唯物史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与无政府主义的激烈论争中,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批判,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中央政府权力、鼓吹绝对自由的论点,李达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指出: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①,要把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区分开来;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组织上的分散主义和分配上的绝对自由主义,李达提出:这种主张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符,旧社会的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②李达认为应当采用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方式。他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作了介绍和理论阐述。

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宣传中,李达特别注重唯物史观对于社会革命的指导意义。1921年四五月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赫尔曼·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两部著作,对社会问题的由来、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学说的内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阐释了唯物史观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认为唯物史观“说明社会生活决定人的精神,把人的思想归入一定的轨道,决定个人或阶级的意志和行为”,是考察事物、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哲学,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权力,非采用这种哲学不可^③。这为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革命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正是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李达开始将唯物史观从纯粹的理论探讨转向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理论阐释,尝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形,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意义。首先,李达充分肯定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他指出:社会构成的基础,是“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和当时的生产关系相冲突”,由此引发了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应通过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④。而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完全要看那社会的环境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战争的勇气怎样才能决定”,在这里,李达意识到了革命不仅仅由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还与阶级斗争和种种主观要素(如传说、能战的勇气和决心等)相关;其次,李达结合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实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并参照马克思给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所设的计划来制定政策,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但共产党要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最后,李达指出,在中国的社会革命中,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权,“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并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产业状况列出了12项可采取的具体措施^⑤。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表明李达对唯物史观认识的逐步深化,并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思考中国社会革命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①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6页。

② 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一卷,第46~47页。

③ [荷兰]赫尔曼·郭泰:《唯物史观解说》,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一卷,第400~401页。

④ 李达:《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110页。

⑤ 李达:《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三卷,第113、116、118页。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讲授唯物史观,后又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唯物史观。1926年6月,他将这一时期讲授唯物史观的讲义整理为《现代社会学》出版。李达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对于社会革命的指导意义,指出:“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①《现代社会学》被认为“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李达本人)以前阐发唯物史观的论著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是当时“最准确最系统而又最通俗的联系中国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著作”^②,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③,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李达在该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表现出独到的理论见解:

一是对经济决定论进行反思,彻底冲破了早期唯物史观阐释的机械决定论的樊篱。李达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对社会的本质、构成、起源、变革、意识、阶级等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在李达看来,社会之所以发生变革,是由两种现象决定的:其一是物质方面,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于是有了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其二是精神方面,受前者的影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变革不仅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且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着,所以“物质的条件与个人之努力二者皆社会变革之要件也。”^④在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重视人类意识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反思与再阐释,表明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是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李达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概括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指出贯穿这三大部分的是阶级斗争说。李达认为,马克思是以各个人获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无产阶级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来源,而资产阶级以占有生产资料获得生活来源,“有产无产两阶级之间,存有极大之矛盾,判若鸿沟,互相对立,由对立更进而成为阶级斗争。”^⑤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在于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利用政权将私有资本收归公有,以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人,强调阶级斗争也就意味着肯定人的精神或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肯定了生产力与阶级斗争各自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将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结合起来。

三是对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分析。《现代社会学》并不仅限于对唯物史观的一般理论介绍,其“在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方面的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⑥。李达在论述了帝国主义的一般特征后,指出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已经沦为“国际的半殖民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手段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直欲永远陷中国于分崩离析万劫不复之境”,指出“中国年来之国民革命运动,其殆为帝国主义侵略之

① 李达:《现代社会学》,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② 陶德麟:《〈现代社会学〉再版前言》,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③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④ 李达:《现代社会学》,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95、92页。

⑤ 李达:《现代社会学》,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144页。

⑥ 陶德麟:《〈现代社会学〉再版前言》,李达:《现代社会学》,第2页。

反响也欤!”^①他还分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与工业先进国的不同,后者是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社会问题,而中国的社会问题则是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制约而导致产业得不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权、革命步骤、革命前途等基本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中国革命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非小资产阶级;革命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先取得政治的经济的独立,第二步,加速发展本国产业和文化,以构成世界大同社会之基础;革命取得成功后,应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达于社会主义;强调革命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式阐释。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观点的阐释并不照抄经典作家的原文,而是用自己的语言作中国式的表述。如他对“国家”“阶级”“社会”“社会意识”“社会运动”等重要概念的定义,都使用了这种独特的阐释方式:“国家乃社会之机关,由特殊阶级,以经济的剥削之目的支配下层阶级,并为防止内部革命与外部攻击而造成者也。”“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出,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历程中所构成之社会的系统而生者也。”“社会者,各个人为满足经济欲望而直接间接加入生产关系之结合也。”又谓“各个人为谋满足欲望而加入生产关系之结合,谓之社会。”“社会意识者,各个人为谋取得生活资料不能不共同服从其支配之意识也。”“社会运动,有广狭两种意义。依广义解释之,凡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部类,直接谋改良自身生活或间接谋增进自身利益之有组织的运动,皆称为社会运动。就狭义解释之,必须被压迫阶级为谋自身解放而反抗压迫阶级之有组织的运动,始称为社会运动。”^②这种中国式的阐释,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又易为中国的读者所理解。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他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的政治纲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老右派背离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其各派别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任意曲解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由于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愤怒和党内“左”倾政策的影响,也一度改变了对三民主义的看法。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第二十五号通告中指示:“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③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李达怀着对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从国家、民族的大局观念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分析和阐释,比较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指出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积极意义,以探寻真正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主张。

① 李达:《现代社会学》,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176页。

② 李达:《现代社会学》,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63、119、73、22、74、163页。

③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9页。

第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哲学基础——民生史观进行系统分析,阐述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的异同,强调二者可相互补充,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务。

1928年5月,李达发表《民生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民生史观进行系统分析。一方面,他从社会发展、变革的层面,分析了民生史观的基本内涵,指出:民生史观,就是以民生为中心来说明社会组织和社会进化。民生是社会发达的中心,人类的其他一切关系,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科学、艺术都是以民生为中心而发生的。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组织不好,有了毛病,发生了民生问题”,社会变革“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要使一切人都有工做,都有饭吃,都能生存。”^①另一方面,李达着重分析了中国民生问题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的民生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实业革命才发生”,主要是受帝国主义侵略而与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与欧美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最终实现社会大同。该文虽然将落脚点放在民生史观,强调民生是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但是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即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即经济)为出发点来探寻民生问题,论证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

同年6月,李达又在《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一文中对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作了较深入的比较分析,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也有很多共性的内容。首先,就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意义而言,民生史观以民生(人类的生存)为社会的中心,无论在什么时代,求生存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唯物史观以经济(物质的生产力)为中心,本来这一点在任何社会都是说得通的,但是,“把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在一起……只有有阶级的社会才是这样”。虽然二者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革命性和最后的目的是相同的。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民生史观把一切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并未特别注重社会组织的阶级性;而唯物史观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特别强调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对“阶级性的特别注重与否”,是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本质性区别。再次,由于二者的出发点不同,革命方法也不同。李达分析指出,三民主义革命以中国半封建社会为出发点,由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领导被压迫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络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抗世界帝国主义,实行以党建国和民生主义,以谋经济建设;而马克思主义革命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出发点,由社会革命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反抗世界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②。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李达指出:虽然民生史观以“纵的社会观念为主眼”,唯物史观以“横的社会观念为主眼”,但是二者都是旨在说明社会组织和进化的原理,在一定的時候可以用来互相补充^③。这样,既对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从学理上作了清晰的区分,又充分肯定了二者的共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实现社会大同的目的。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三民主义学说,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进行革命性阐发。

1928年7月,李达发表《三民主义之社会学的研究》一文,探讨如何研究三民主义问题。他认为,三民主义既是国民革命的理论,同时又是“由社会组织和进化的原理产生出来的革命理论”,要认识革命的三民主义,就要对三民主义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应当从“社会组织和进化的原理”上着手。李达所说的“社会学”就是指唯物史观。他提出研究三民主义应从五个方面展开,即研究“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半封建社会内部变化的历程”“中国半封建社会到三民主义社会的发

① 李达:《民生史观》,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00页。

② 李达:《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26、231、233页。

③ 李达:《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35页。

展进程和内在关系”“社会的矛盾运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李达分别从“纵的”和“横的”两个层面对三民主义进行分析。在“纵的研究”上，李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人类社会经历的原始时期、封建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三民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民生问题，清朝专制政治导致了民权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国家思想的传入引发了民族问题；在“横的研究”上，李达分析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中国社会发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关系的变动^①。进而指出：从唯物史观的分析出发，无论是从“纵的”还是“横的”方面来看，三民主义所倡导的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都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力图从不平等状态的现代进到平等状态的新时代。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进一步阐发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及革命的方法。他指出：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是“在实现人类平等，世界大同，质言之，是在要求人人都能生存，人人都能充实其生存。”至于革命的方法，要根据中国社会状况而定。在李达看来，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相同，但前者是以半封建的社会为出发点，后者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出发点，而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应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即在民族主义方面，团结中国被压迫民众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以自求解放，自求生存，更推广此种精神使一切民族都能生存，都能解放，形成国际上个个民族平等的局面”；在民权主义方面，“用打倒帝国主义的精神，确立无阶级区别的人人平等的政治”；在民生主义方面，“是用同样的精神，建立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更运用政权，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树立民生主义的经济。”^②

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对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阐发，从社会组织进化的角度剖析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目的和革命精神，指出了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共性特点，凸显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

第三，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致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所要依靠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的革命问题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来决定。李达在1928年9月发表的《完成民主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以殖民地民族和半封建社会为出发点的，支配着殖民地民族和半封建社会的势力分别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此，中国革命“一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一是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③，而革命的必然结果是达于社会革命。明确指出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李达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为实现国际平等、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即压迫阶级，除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外，还有官僚、买办、土豪劣绅、财阀。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即广大的被压迫阶级群众，包括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国农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政治和土豪地主的三重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民主革命的大台柱”，中国革命离开了农民，“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④；城市小资产阶级由小工业家、小商家、手工业的店主等分子构成，他们的革命主观力量薄弱，需要革命者引导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工人

① 李达：《三民主义之社会学的研究》，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57、258~259、263~267页。

② 李达：《三民主义之社会学的研究》，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67页。

③ 李达：《完成民主革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305页。

④ 李达：《完成民主革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310~311页。

则包括新式产业劳动者、手工工人、店员、苦力、工役等，是革命的基本力量^①。至于资产阶级，软弱性使他们不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因此，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国共两党武装对抗的背景下，李达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出发，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革命政党继续团结合作的必要性问题，他重申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和“联共”政策，指出：依照国民党1924年改组的精神来看，中国所需要的革命是为着实现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国民革命。然而，国共合作破裂后产生了许多纠纷，在国民党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连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也深致怀疑，以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含有共产主义的成分，总觉得有些不妥”；而共产党方面，也有一部分人因愤慨国民党的反革命屠杀政策而“索性专干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暴动政策”^②。李达认为，这部分国民党人干的是不彻底的民族平等的运动，而共产党人干的是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都与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他呼吁：中国革命尚未成功，一切革命者，务必及早共同认清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目标和原则，“一致团结起来，重整革命的旗鼓，积极唤起广大的革命群众，大举向封建势力进攻。”^③虽然这种主张在当时土地革命和国共两党武装对抗背景下不具有现实性，但是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的分析是准确的，对于民主革命阶段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一致性的认识也是正确的。反映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深刻认识。

三、对唯物辩证法的探索性研究和应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苏联唯物辩证法研究的影响，唯物辩证法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风行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这与李达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时即有论者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④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影响最大的是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介绍则较少，仅偶见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及瞿秋白的几本著作中。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理论界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也显得非常薄弱。国民革命失败后，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由之前主要关注日本和西欧的文本逐渐转向关注苏俄文本，并将注意力转向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从1928年到1932年，李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陆续翻译、出版了十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些是合译），其中有5部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分别是：日本杉山荣著的《社会科学概论》^⑤，德国塔尔海玛著的《现代世界观》^⑥，日本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⑦，

① 李达：《完成民主革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310~311页。

②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74~275页。

③ 李达：《完成民主革命！》，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312页。

④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74页。

⑤ 《社会科学概论》，由日本杉山荣所著，李达与钱铁如合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3月出版。

⑥ 《现代世界观》，作者为德国塔尔海玛，李达根据日文本并参照德文本译成中文，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9月出版。

⑦ 《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为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上篇，李达、王静、张栗原合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6月出版。

苏联卢波尔著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①，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②。这些理论著作从哲学发展的历程，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来源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唯物辩证法与唯物论、进化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苏联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两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革命经验相结合，包含着丰富的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容，为中国学者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

1937年，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这部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是当时中国最系统、最准确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缺乏整体性把握。李达《社会学大纲》对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以及它们在社会历史、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作了详细的阐述，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空白。

第一，《社会学大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阐释，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社会学大纲》共五篇，按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篇为唯物辩证法，对唯物辩证法的前史、生成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法则分别作了清晰的叙述，从人类认识史的综合、哲学的科学、认识论这三个维度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原理。第二至五篇为历史唯物论，介绍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阐释了历史唯物论的论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运用此理论分析社会的经济构造与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两大部分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因此，它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③。《社会学大纲》几乎涵盖了今天所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的最全面、系统的阐述。

李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内部的各个部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只有彻底地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④在李达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统一。这样，李达突破了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包括李达本人）将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阐释理论，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李达还站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内在统一的基础上，对各种唯心论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如，他批判了伯恩斯坦一派用新康德主义修正历史唯物论，又对考茨基——表面拥护哲学的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却站在分离世界观与方法、分离理论与实践的机会主义立场——提出严厉批评。李达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统一，坚持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不可分

^① 《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苏联卢波尔著，原书名为《列宁与哲学——哲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李达以其德译本为底本并对照日译本译成中文，上海心弦书社1930年10月出版。

^②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与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9月出版。

^③ 李达：《社会学大纲》，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④ 李达：《社会学大纲》，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二卷，第216页。

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克服了苏联哲学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二分并立的模式,凸显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独特个性。

第二,提出“实践的唯物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1930年,李达在大夏大学作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演讲时讲道:“辩证法的唯物论,是知识方法论,同时亦可说是行动上的方法论,又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指示吾人以自然与社会变动的方法。且使人们按此种方法,作实践的活动。”^①揭示了探寻哲学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活动。李达将这种思想一以贯之,在《社会学大纲》开篇就提到,“单只暴露了上述的法则,还不充分,必要的事情,是基于被暴露了的法则,指示实践的方法,以促成由一种社会有机体进到别种高级社会有机体的变革”^②,以此为基础,李达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新的理解。

李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实践的唯物论”,主要因为唯物辩证法的基石是实践的,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过程来看,唯物辩证法是在与形而上学唯物论及观念论的哲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而这种哲学斗争与经济学及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政治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它的发展,是通过阶级社会的历史实践来实现的。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概念的内涵规定而言,实践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劳动、实践概念引入唯物论之中,把劳动看作是人类与自然的结合。这种对劳动(实践)的意义的正确理解,超越了旧唯物论和唯心论把自然与人类相分离的状况,“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这是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与此同时,实践概念在认识论的范畴中也有着重要意义。李达观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适合于一切的领域,具有普遍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普遍性规律,必然是建立在综合各种个别科学结论的基础上的,而个别科学的结论,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实践既是认识的出发点,又是认识的落脚点,是检验认识正确性的唯一标准,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实践通过个别科学而间接地成为哲学的基础。哲学的真理性,也必须通过个别科学而由实践所证明。”^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

李达“实践的唯物论”概念的提出,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也为无产阶级开展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历史和哲学上的理论依据。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问题之中,为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根据李达最初的设想,《社会学大纲》前五篇探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规律,第六篇则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且已准备了研究大纲和材料。然而,由于“无暇整理”,第六篇并未正式出稿,但其想要表达的研究结论,实际上已包含在前五篇及他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

1929年,李达撰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著作,从经济发展、社会历史和民族历史等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问题、革命性质等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作了叙述。他指出,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必须从经济里去探求,只有对产业革命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

① 李达:《辩证法的唯物论》,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② 李达:《社会学大纲》,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二卷,第7页。

③ 李达:《社会学大纲》,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二卷,第69页。

的计划”^①，因中国和欧洲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内容不同，中国社会问题有着特殊性，因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要求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②这种认识与后来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高度契合。在民族问题上，李达认为民族问题既是世界革命又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革命是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的一个纽带。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出发，考察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过程及民族政策的变化，指出东方各国落后的原因，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的过度剥削与殖民地政策所导致。为打倒帝国主义，世界上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结成世界革命的国际联合战线。

李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的重视，又强调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把握，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中探寻中国的出路，正如他在《社会学大纲》1937年版序言中指出的：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绝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现阶段中国人的使命，就是使中国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解放出来，为此，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③李达从中国现实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问题，一方面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作了系统、完整而又独到的阐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提出并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构建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此外，李达还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思维、历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货币学、法理学、历史学等领域，在这些领域撰写出版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和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和前瞻性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中国化。这些理论贡献，使他成为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诚如时人所指出的，“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达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传播与阐释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最早较完整、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构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运用与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本文作者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王昌]

① 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② 李达:《社会之基础知识》，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五卷，第372页。

③ 李达:《社会学大纲》，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二卷，第3页。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